

【区域高质量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模式视角下的“内卷式”竞争及其制度根源*

张翔 冀保峰

摘要:“内卷式”竞争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溯源“内卷”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在现有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框架下考察“内卷式”竞争及其经济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地方产业政策在实施过程中缺乏跨区域的协调,地方政府在有限市场需求规模下追求区域利益后导致了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这为“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创造了必要条件。在以供给侧优先的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通过产业政策降低辖区内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支持产业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形成“重生产轻消费”的供给侧优先发展策略。发展型的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企业投资和生产,经济增量发展转变为区域间的存量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对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需从改善供需弱化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入手,加快对地方政府激励的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完善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和高效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引导地方政府职能重心由供给侧干预向需求侧管理转变。

关键词:“内卷式”竞争;区域竞争;产能过剩;供给侧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4-0039-12 **收稿日期:**2026-04-2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城市数字化转型的空间经济效应研究”(25FJLB050);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研究重大项目“国家智造战略产创融合的应用与研究型高端人才培养模式与实践”(2025SJGLX010Y)。

作者简介:张翔,男,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浙江省“八八战略”创新发展研究院、浙江省高能级科创平台体制机制创新软科学实验室研究员(杭州 311121)。

冀保峰,男,河南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工学博士(洛阳 471023)。

一、引言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在我国多个行业持续蔓延,具体表现为价格机制失灵、同质化竞争、市场无序扩张等现象,这反映出国民经济资源配置效率下降、经济发展空间受限与产业结构失衡的系统性问题。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首次在官方层面提及防止“内卷式”竞争;202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综合整治‘内卷式’

竞争,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202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十五五”规划的会议,再次提及“依法依规治理企业无序竞争,推进重点行业产能治理”“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可见,地方政府与“内卷式”竞争存在密切联系——在缺乏有效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下,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竞争是引发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重要原因。

“内卷式”竞争反映当前中国经济深陷供给主导的老旧增长模式,无法摆脱靠补贴推动产业扩张

的困境,在供给过剩的状态下停滞、重复、折腾及就地打转的现象。它描述当代社会竞争加剧、边际收益递减的现象,揭示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瓶颈,即从“做大蛋糕”到“争夺有限蛋糕”的转变过程中,微观经济主体努力与社会整体进步之间的断裂。“内卷式”竞争严重威胁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一是“内卷式”竞争具有典型的资源内耗性。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和资源条件下,地方政府和企业等竞争参与者将大量有限的资源投向低水平、同质化的生产之中,资本与劳动力被过度集中于低效领域,难以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这种竞争模式导致经济系统整体效能不升反降,有限的资源被空耗,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创新活动受到抑制。二是“内卷式”竞争具有典型的社会空转性。参与“内卷式”竞争将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本和资源,但整体产出效率和效益并未相应提升,甚至下降。低水平重复与创新窒息,引发经济系统锁定与恶性循环,陷入一种“有增长无发展”的停滞状态。因此,“内卷式”竞争抑制创新活力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严重阻碍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内卷式”竞争耗费宝贵的人力资本和降低创新活力,但其根源却不在微观经济主体,而在于微观经济主体所处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制度环境。如若企业恶意压低价格,以远低于成本价倾销商品、抢占市场份额,则构成不正当竞争,就会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等法律规范约束。同时,企业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微观经济主体,如果市场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正常发挥调节作用,长期以远低于成本价格倾销商品对企业而言不符合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市场逻辑,不具有可持续性。因此,在正常的市场经济环境和完善的法律体系下不存在长期“内卷式”竞争,但为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会普遍存在“内卷式”竞争?从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看,其根源在于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发展,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的行为导致产能持续扩张和过剩。刘志彪等(2025)就曾明确指出,当前中国发展中出现了总需求向服务业集中而总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矛盾,各级政府却一直鼓励加大对制造业的投资和维持制造业的比重,而对服务业的诸多领域仍保持严格管控,这进一步加剧了供需失衡,导致供给过剩的行业普遍存在“内卷式”竞争。在供强需弱的经济环境里,“内卷

式”竞争的资源内耗性和社会空转性是由于在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各级政府的产业政策仍继续影响企业增加投资和扩大供给导致的。然而,为什么即便是在供强需弱的经济环境,地方政府和企业仍将重心放在供给侧,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扩张产能和增加供给,而不是用于扩大消费和需求,以解决经济供需失衡?为此,本文将从地方政府主导区域经济竞争的角度系统梳理已有的“内卷式”竞争相关研究进展,剖析“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其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概念内涵与文献综述

(一)“内卷式”竞争概念的讨论与定义

“内卷”泛指一种没有意义的过度竞争。“内卷式”竞争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内卷是与发展相对应的概念(黄宗智,2002),被视为努力的“通货膨胀”。内卷是经济达到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的现象。无意义的精益求精是内卷,将简单问题复杂化、限制创造力的内部竞争也是内卷。“内卷式”竞争是围绕特定市场空间的低质竞争、重复竞争,具有鲜明的内耗性和残酷性。“内卷式”竞争是竞争的一种异化形态,其超出了竞争的合理界限,演化为过度的内部竞争状态(邹晓蔓等,2025),表现为同质化价格战、创新动力衰退与资源错配加剧的恶性循环(赖淑君,2025);“内卷式”竞争可以被视为一种“多人囚徒困境”,国内供给规模增长过快,长期持续性的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市场规模增长有限,最终使企业陷入“内卷式”竞争困境(王海燕,2025)。

“内卷”并非当下一个新概念,只是“内卷”一词近年来才在互联网上引起强烈共鸣和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针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内卷”概念就被黄宗智(2000)等学者引入并进行系统研究,“内卷的要旨在于单位土地上劳动投入的高度密集和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减少”,最初用以形容中国农业发展有增长无进步特征。后来被拓展到指系统在外部扩张条件受到严格限定的条件下,内部不断精细化和复杂化的过程(刘世定,2004)。广义上所有无实质意义的消耗都可称为内卷。就经济领域而

言,“内卷式”竞争是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内卷式”竞争是在其他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持续地被吸收到特定产业中获取收益并使特定产业内部变得更精细、更复杂的过程。精细化只是“内卷式”竞争中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在国民经济供给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企业为了生存,展开手段越来越复杂细微、程度不断加剧、结果不断恶化的竞争(王海燕等,2025)。上游行政性垄断与下游过度竞争的失衡格局,叠加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技术依赖与市场锁定,共同构成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空间(刘衍峰等,2025)。“内卷式”竞争是资源被无休止的价格战、营销内耗与低水平重复损耗,宝贵的人力资本被用于职场内斗、低效竞争、应试技巧,而非实质性价值的创造上。供强需弱的宏观环境导致低价供给与低价需求相互强化,使得宏观经济运行陷入“低价竞争—商品低质—消费降级”的恶性循环,偏离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欧阳日辉等,2025)。“内卷式”竞争是在经济下行和全球化倒退双重压力下的适应性反应,兼具市场机制缺陷的普遍性和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特殊性。总之,“内卷式”竞争是地方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发展造成的市场失灵,尤其是价格调节供需平衡机制的失灵,其根源在于国家经济发展放缓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内卷外溢到经济领域。

“内卷式”竞争造成当财富红利消失、发展空间收缩、原有激励相容无法维持。在缺乏新增长点的情况下,个体或组织只能通过争夺有限资源来维持生存或获得微薄收益,进入竞争加剧但收益停滞的非效率状态,这时上升通道收窄,资源向既有优势群体集中。为获取同样的收益,需要投入远超以往的精力、时间和资源,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甚至零和博弈现象。本质是企业有限市场空间内的过度挤压(卢晓雯,2021),社会价值观单一迫使个体挤入有限的赛道,无法根据自身特质选择差异化发展路径。个体为自保或微薄优势而加倍努力,结果却推高了竞争门槛,导致所有人处境更差,陷入囚徒困境。当竞争沦为零和博弈,信任与协作减少,恶性竞争、资源封锁、相互损耗就会成为常态。经济制度与社会激励机制未能适应新环境,反而强化了人力资本的内耗,微观主体努力无法转化为系统性的整体进步,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困境。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内卷式”竞争不仅已经存在于传统行业,而且已蔓延到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领域。例如,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中国“新三样”产业虽然保持了较快增长速度,但也面临着“内卷式”竞争加剧的问题。近年来汽车行业的价格战,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价格竞争,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营业利润率降至3%—4%的水平,燃油车的利润率则更低。当前汽车行业的困境反映了“内卷式”竞争的同质化和低效低水平的问题所在,虽然中国汽车行业产能扩张迅速,但汽车需求增长的幅度远低于产能扩张的速度,车企为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内卷式”竞争则是其市场经济规则体系下的理性选择(见表1)。传统观念认为“内卷式”竞争通常存在于成熟产业,但由于科技优先发展的战略和经济体制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国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现象(李晓华,2025)。为了抓住新产业发展的机会,大量企业会在同一时间进入,从而扭曲投资,出现产能过度扩张、供大于求的情况。为缓解“内卷式”竞争压力,增加产品市场需求,部分企业开始拓展海外市场(张鹏等,2025),“出海”成为当前企业获得生存空间的主要选择之一。然而,中国企业大规模“出海”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卷式”竞争外溢到世界各国,又引发新的贸易保护主义问题,除美国以中国贸易顺差过大为由与中国打“贸易战”,欧盟也正在重新评估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保护本地区的产业。

表1 2023—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能利用率

年份	新能源产量	已建成新能源产能(估算)	产能利用率
2023	958.7万辆	约1300万辆	约70%
2024	1288.8万辆	约1800万辆	约70%
2025	1662.6万辆	约2400万辆	约68.7%

数据来源:新能源汽车产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已建成新能源产能、产能利用率数据作者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产销快讯》及《2026年中国汽车整车市场占有率及行业竞争格局分析报告》整理而来。

(二)“内卷式”竞争的形成机制及其经济影响

“内卷式”竞争的典型特征是同质化竞争显著和低价格竞争模式盛行。在以行政区为主体而非以经济区为主体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中,地方政府以财政补贴为主的产业政策是导致“内卷式”竞争

的重要原因(张杰等,2025)。内卷不是企业自发卷出来的,而是地方政府之间用税费优惠、地价返还、电价补贴、举债补贴、“抽屉协议”拼出来的,这会导致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低价血战。行政区内的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利益密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行政区利益主体特征明显。地方官员迫于晋升压力以及囿于任期和任职地资源有限,忽视所辖地区长远发展或者实际情况而倾向于选择易于达成的或上级强烈重视的目标以与其他地区展开竞争,引发重复建设、产能过剩、过度投资等一系列负面影响(马恩涛等,2024)。地方政府的“内卷”被认为是从源头上导致企业间的不公平竞争、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孙晋,2025)。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产生一哄而上追热点、盲目补贴上项目等违背市场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的“内卷式”竞争行为,被认为是“为增长而竞争”的延续(李雪松等,2025)。上游行政性垄断与下游过度竞争的失衡格局,叠加全球化红利消退引发的技术依赖与市场锁定,共同构成了“内卷式”竞争的生成空间(刘衍峰等,2025)。

“内卷式”竞争带来的产出增加并不是劳动边际产出的增加,而是劳动工作时长或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带来的产出增加。“内卷式”竞争并不是非理性的过度竞争,而是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下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导致的“合成谬误”。有学者把“内卷式”竞争视为非理性的过度竞争(陆雄杰,2026),然则这混淆了“内卷式”竞争与不正当竞争的概念。如果是非理性的不正当竞争,国家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公平竞争相关法律法规可整治这类行为,而非必须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显然,“内卷式”竞争不是企业非理性的不正当竞争。从市场微观主体的角度看,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内卷式”竞争都是市场经济中理性的行为选择,但对于微观经济主体而言的理性选择,对于宏观经济而言未必最优,存在“合成谬误”。这说明“内卷式”竞争并非微观经济主体偏离了市场经济的规则体系,而是制度环境所造成的宏观效率损失。

“内卷式”竞争的本质是资源配置问题。按照古典经济学理论,微观经济主体各自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作用下,能够实现社会整体福利最大化,但为何市场机制会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失灵引发“内卷式”竞争?关于“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丰富

的讨论。黄宗智(2000)指出劳动生产率在密集化状况下保持不变,在内卷化状况下边际递减,在发展状况下扩展,“内卷式”竞争是劳动生产率边际递减的竞争。之所以会产生“内卷式”竞争,是市场化不足或者至少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果(郭威等,2025),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优惠和对重复项目投资的追逐,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经济领域的“内卷式”竞争两个最核心特征:同质化竞争和低效竞争。同质化竞争主要通过价格战进行,而“非价格竞争”如品牌建设和技术创新则进展缓慢,不是主要的竞争方式。这种低效低水平竞争则不是一种良性竞争,体现为利润率持续下降,其无法改善消费者福利,也不能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更不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集中有限的资源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地方政府落实中央战略决策的要求,这导致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存在“潮涌现象”(李晓华,2025)。已有的研究对“内卷式”竞争的概念内涵及其形成机制进行了系统研究,但缺少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视角探究“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制度根源。简单将“内卷式”竞争归结为企业恶性竞争或过度竞争,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因此,区别于已有的研究,本文将分析的重点放在产生“内卷式”竞争的区域环境之中,从现有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并结合国民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地方政府供给侧优先的区域竞争探究“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

三、地方政府在“内卷式”竞争中的作用

(一)地方政府对辖区内增加产能的政治激励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的视角看,“内卷式”竞争是当前生产关系不能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反映的是当前国民经济的竞争从价值创造异化为存量资源争夺乃至价值抵消。“内卷式”竞争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阻碍生产力发展,束缚创新活力、生产效率与消费潜力的提升。中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产业竞争,实现了经济的迅速起飞,但同时也导致大量的产业同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自20世纪80年代财政分权改革以来,中

央与地方政府间逐步确立的财政分权体制,通过赋权与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领域开展竞争(周飞舟,2009)。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作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制度创新,长期扮演着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地方政府实际控制着辖区内土地、矿产、金融资本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供给与配置,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对于地方政府重点扶持的产业会通过压低生产要素价格降低企业供给成本,帮助企业重复投资和扩大产能,促进整体市场产能的急剧扩张。

传统发展模式依赖以区域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绩考核体系与以本地生产税收为主的财税分成机制(周黎安,2007)。在“为增长而竞争”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内卷式”竞争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是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财政收入等量化供给侧指标为核心的政治晋升竞争,使得地方官员有强烈动机在任期内最大化本行政区的经济表现。地方政府官员为实现政绩最大化展开政绩竞争,从而激发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以“增长竞争型政府”来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往往与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资规模等经济发展指标挂钩,形成“政治锦标赛”模式(蔡之兵,2026)。这促使地方官员倾向于通过加大投资、扩大基建、提供土地和税收优惠等方式争夺有限资源和项目,各地政策高度同质化,导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形成“为增长而竞争”的横向内耗(周黎安,2004)。

为实现特定的国家战略目的,中央政府通常会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中央政府确定重点发展的产业以后,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定发展的重点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例如,2024年1月,工信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前瞻布局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新赛道。此后,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省市都先后将这些未来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集中区域内有限资源投向未来产业,争创未来产业发展高地。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中央确立发展的重点产业,并展开区域竞争,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产业竞争将会集中投入到重点发展的产业,有可能加速这些受到重点支持的产业实现技术突破,形成产业竞争优势;另一

方面,当这些受到重点支持的产业发展起来以后,由于产能扩张速度远大于国内市场需求增长速度,就会形成“内卷式”竞争,即所有地区都是未来产业发展高地,也就不存在所谓的“未来产业发展高地”。

(二)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内卷式”竞争及其经济影响

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是行政化配置资源干扰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微观市场主体“内卷式”竞争背后是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扰乱价格调节供需平衡机制导致的存量内卷。在赶超型发展战略下,形成了中央政府明确产业方向、相关部门制定产业政策、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深度参与产业发展模式(蔡之兵,2025)。“内卷式”竞争虽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表现出来,但并不是市场自发形成的,而是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长期积累以后的国民经济运行不顺畅的表现,是地方政府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产业政策过度干预经济、扭曲资源配置的制度性结果。地方政府主导区域间招商引资的逐底式竞争催生重复投资与产能过剩,各地产业布局高度同质化,企业在有限市场空间内进行低水平重复竞争,无法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地方政府主导区域间的“内卷式”竞争也表现为“行政区经济”。地方政府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形成以行政权力为主导、以行政区划为边界的封闭型经济系统,具有封闭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孙久文等,2020)。在“行政区经济”里,流域治理、基础设施联通、产业链协同、要素自由流动等需要跨行政区合作的事项,因区域利益纠葛和地方政府考核各自独立而推进缓慢。在以行政边界为壁垒和地方政府行政力量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下,区域间的“内卷式”竞争的性质是在既定体制框架下围绕区域经济竞争的深化。各地政府在制定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时,首要考虑的不是区域在全国乃至全球产业链中的比较优势,而是如何在行政边界内培育完整的或高端的产业链,这就导致严重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本质上是行政化配置资源的制度性产物。一般而言,有效的市场竞争并不产生“内卷”,市场机制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之所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

“内卷式”竞争,是由于要素市场被扭曲,价格机制无法顺畅调节供需关系,并长期积累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整体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行政化方式配置生产要素仍是生产要素配置的主要方式之一。地方政府通过扭曲生产要素价格来干预辖区内经济,是形成“内卷式”竞争的关键机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称为“制内市场”的经济体制(郑永年,2022),地方政府通过土地优惠、税收返还、补贴和信贷干预等手段,降低企业成本,扭曲要素价格。这种政策洼地竞争导致企业投资决策不是基于市场效率,而是追逐政策红利。在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能够高效率地动用计划经济旧体制所掌握的资源(黄宗智,2009)。工业用地远低于市场价甚至零成本出让,有的还承诺后期税收返还,以吸引制造业项目。通过产业扶持资金等形式部分或全部返还土地出让金,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协调,引导本地银行为特定企业提供低息贷款;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或国企为重点支持发展的企业融资提供隐性担保。

从经济寻租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也是租值耗散的过程。“内卷式”竞争是租值耗散在现实社会中最常见、最生动的表现形式,本应属于消费者或者生产者的经济价值在竞争过程中被无谓消耗。在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扩张停滞或规模收缩的情况下,为争夺有限的市场需求,企业不得不低价出售商品。“内卷式”竞争通常以低价为主要竞争手段,这会导致行业利润率下降和失业增加,消费能力进一步下降的恶性循环。以往在经济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热衷于基础设施和工业园区建设,遵循“由上到下”的产业规划模式,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压低辖区内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开展招商引资与产业培育扶持。例如,当前部分西部欠发达地区不顾自身基础,跟风发展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新兴产业。在持续上升的经营压力面前,企业竞争加剧,也即所谓的“内卷式”竞争。一些企业通过“卷价格”实现“以价换量”,尽可能扩大需求、抢占市场份额,结果就出现了“增量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发展困局。“内卷式”竞争是从地方政府激励相容转向租值耗散,对地方政府的制度激励扭曲所导致竞争形态异化的过程。地方行政力量干预资

源配置,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技术等关键生产要素的价格形成机制尚未市场化,生产要素无法依据价格信号流向效率最高的部门,导致产能配置失衡,因为行政力量会通过产业政策、科技政策和区域政策等形式对关键核心生产要素进行配置。例如,地方政府对光伏、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特定产业的战略扶持,产生产业政策信号的引导,可能引发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强烈投资冲动,快速形成过剩产能。此时,企业决策不仅基于市场价格信号,更多是对政策红利的追逐。例如,前期各地政府竞相补贴新能源汽车行业扩大产能,导致新能源汽车行业库存高企直接引发价格混战,全行业利润率下滑甚至亏损。

(三)区域发展协同性不足引发“内卷式”竞争

长期以来,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被认为是激烈的区域竞争,而区域竞争的动力来自地方官员升迁的政治激励。通过推动辖区内经济增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尹振东等,2020)。长期以供给侧指标为核心的政绩考核与晋升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集中在供给侧。为了获得快速晋升的机会,地方官员倾向于选择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短、见效快的项目,财政资金多用于补贴生产和扩大供给,而忽略了市场需求与之相对应的扩大,进而出现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中国企业的部分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各个环节受到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补贴等政策支持,价格机制在调节企业投资行为中的作用有限。各级地方政府对重点支持发展产业的倾斜性补贴诱发了全国层面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王文甫等,2014)。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的经济导致企业实际退出市场困难,企业获得地方政府“父爱主义”保护的同时,也面临着更高的行政性退出壁垒(白让让,2017)。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对需求侧的忽视进一步加剧了产能过剩和供需错配,消费刺激政策乏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均、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问题长期存在,内需潜力长期难以激发释放。这种重供给轻需求的区域经济发展惯性,使得国民经济结构调整迟迟难以突破路径依赖,最终制约了高质量发展的纵深推进。

区域之间缺乏有效协调与分工机制,也加剧

了“内卷式”竞争。地方政府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后,拥有了多种参与市场竞争的手段。其中,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政策是地方政府常用的区域竞争方式。近年来各地相继设立了名目繁多的产业引导基金,地方政府以风险投资人的身份参与区域经济竞争,将地方政府的“内卷式”竞争转化为区域经济的“内卷式”竞争。“以邻为壑”“互害式”产业政策竞赛对特定产业采取超常规奖补政策措施,对重点企业给予巨额补贴和优惠加剧企业跨区域政策套利。部分地区招商引资在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可达40%,导致资源向能快速拉升官员业绩数据的领域倾斜(晏军锋,2025)。由于跟着政府产业政策投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红利,引起企业一哄而上,投入中央确立重点发展产业,造成重复投资、无效投资和产能过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4.41%,低于80%健康线约5.6个百分点,且已连续第三年下行。表2列出了2025年中国代表性过剩产业的产能利用率情况,尽管经历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传统行业产能过剩问题仍然突出。

表2 2025年中国典型过剩行业产能利用率

行业名称	产业利用率
水泥/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61.6%(其中水泥行业约50%)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69.8%
光伏产业	约51%
动力电池及储能行业	约60%

资料来源:属于国民产业分类标准的行业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其他则由作者根据网络数据整理而来。

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下,如果中央确定重点产业目录,地方就会围绕中央确定的重点产业目录展开区域竞争,并为此提供土地、税收和补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因为这些产业更容易获得中央部委审批、银行贷款,同时也体现地方对中央战略的贯彻实施能力。此时,地方政府之间也陷入了产能过度扩张的囚徒困境:如果作为区域竞争对手或“对标”区域的另一个地方大力发展了重点产业,而本地却无所作为,那么当地官员将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将处于不利位置。因此,即便有产能过剩的风险,所有地方政府也会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发展重点产业的号召,并根据国家的产业战略布局促进本地产能扩张,最终导致产

能过剩,而市场需求则不会进入过剩。地方政府没有政治激励去扩大辖区内的市场需求规模,一方面原因是需求侧指标不是考核地方政府的核心指标;二是地方政府扩大辖区内的市场规模容易被其他区域“搭便车”,而自身获益有限。因而相对供给而言,市场需求规模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资源,由于市场规模有限,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引起“内卷式”竞争。

中央对地方的供给侧指标考核体系、财政分权结构、支持生产的产业政策导向等制度的顶层设计,深刻塑造了区域的竞争逻辑。各地政府为追求区域经济增长和政策考核目标,陷入同质化、低水平重复竞争的困境。地方政府拥有地区经济发展自主权且有强烈的政治激励,加快辖区内产业扩张,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体制框架下,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其实较为单一,一哄而上追逐政策热点扩张产能会导致区域之间出现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缺乏差异化定位和长期技术积累,尤其是在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背景下,最终陷入价格战和补贴战。地方政府主导的区域之间激烈的产业竞争,围绕招商引资和产业发展,地方政府展开“内卷式”竞争^①,不仅导致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问题,也加剧了市场经济结构失衡,供需错配和供强需弱并存,成为制约国内经济大循环的主要因素。

地方政府之间的“内卷式”竞争行为不受国家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相关法律约束。政府官员在“政治锦标赛”竞争中深度干预区域经济发展,“卷固定资产投资而不卷民生福利保障”“卷产业发展而不卷消费升级”“卷供给增加而不卷需求扩张”。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限的市场需求是宝贵的瓶颈资源,而国民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相较于供给萎缩,恶化了企业生产环境,企业为了获得生存空间过度竞争,产生“内卷式”竞争行为。供强需弱的风险长期积聚引发供需结构失衡问题,形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低水平经济循环。在这样的宏观经济环境中,有地方政府补贴或支持的企业能够获得政策红利,以“内卷式”竞争的方式获得生存空间,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不能将其“内卷式”竞争淘汰。在央地关系、土地财政依赖、官员考核体系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追求辖区内经济增长和财税收入最大化的内在冲动依然强烈,区域之间围绕供给侧各项指标展开“内卷式”竞争的体制性因

素影响会持续传导到市场,引发激烈的同质化竞争和低价竞争。

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而地方政府行为并不受市场规律制约。地方产业政策干扰市场价格的调节机制。当价格不能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时,投资决策就会偏离效率原则。企业“内卷式”竞争的主要表现形式为卷价格,而降价格主要依赖降成本,降成本则源于降薪、裁员、降研发。为了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政绩最大化,地方政府最优策略是重生产供给、轻消费需求,将有限的资源投向生产领域,可能会过度投资基础设施或补贴低效企业,挤占民生与社会发展资源,积累地方债务风险,长期反而削弱增长潜力。在中央政府确立主导产业后,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立的主导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例如,根据中央政府制定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地方政府跟风投资,但由于配套实施细则和区域协调分工机制不完善,导致产业重复投资和建设普遍存在。在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下,中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和太阳能光伏的市场份额分别占全球的60%、70%和80%以上。这说明在缺乏有效的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围绕中央政府确立要发展的重点产业展开激烈的区域竞争,通过各种手段争相降低各自辖区内该产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促进重点产业发展和产能增加,但这些产业的市场规模有限,当全社会的总供给能力增长远大于总需求的增长,“内卷式”竞争则成了地方政府支持发展的企业的理性选择。

在缺乏明确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的情况下,通过产业政策促使企业保持必要的产能过剩是地方政府在进行区域经济竞争时的常用策略,即使产能利用率持续偏低,也要维持必要的产出规模增加。由于地方政府深度干预区域经济的供给侧,被地方政府分割的碎片化的区域供给叠加,形成全社会的市场总供给,但全社会的市场总需求相对稳定。每个区域都在极力争夺有限的市场总需求,尤其是在市场总需求扩张受限甚至萎缩的情况下,随着各地产能增加,市场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需关系的作用,部分企业为获得生存空间,以“卷价格”“卷成本”“卷销售”等形式开展“内卷式”竞争,进一步恶化经济发展的环境。

四、现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下“内卷式”竞争形成的制度根源

(一)地方政府“重生产轻消费”的供给侧优先发展模式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内卷式”竞争与西方经典竞争形式存在本质区别。在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突破市场竞争边界和底线的非合意竞争,给出的治理方案是通过反不正当竞争和反垄断予以矫正市场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竞争偏差。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内卷式”竞争既不是西方发达经济体曾经出现过的不正当竞争,也不是市场垄断,而仍是突破市场竞争边界和底线的非合意竞争,这种“内卷式”竞争带有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性特征,掺杂着市场竞争和地方政府竞争,而非纯粹的市场竞争行为。

在短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中国高速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是地方之间的激烈竞争,而发展区域经济竞争的动力来自对地方官员激励的制度设计。发展区域经济使地方官员可以获得更多财政收入、更高的晋升概率或更多的寻租权力(胡彬等,2021)。但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由“短缺经济”转向“过剩经济”,告别供给不足的时代后,反而出现了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通常而言,在国家快速发展阶段,地方政府掌握的资源更倾向于扩大再生产,而对增强辖区内居民社会保障和消费能力缺乏有效的政治激励,形成“重生产轻消费”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长期运行会产生供给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简而言之,地方政府主导区域产业竞争的行为导致产能扩张大于市场需求扩张,在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总供给必然超过总需求,而供强需弱的情况下,价格发挥调节供需的作用则表现为通缩加剧,微观上表现为低价竞争,之前受地方政府政策扶持而扩大产能的企业为生存而展开“内卷式”竞争的问题逐渐显现。

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地方政府是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的非市场主体,其行动逻辑亦不遵从市场规律。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经济的行为是一种带有政治目标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属于零和博弈的非市场行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执行的产业

政策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性质,政府根据不同阶段,锁定特定重点产业,集中资源优先促进重点产业发展。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地方产业政策导致资源向少数重点领域集中,当新型举国体制支持下的重点领域取得突破,则产能快速扩张;若市场需求增长缓慢或停滞,则出现产能过剩和市场需求不足,受政策支持的企业只能被迫“内卷式”竞争。在钢铁、铝、半导体、造船、新能源汽车等战略领域,地方政府主导的各类补贴使效率低下的企业得以生存,供给过剩成为常态。虽然中央政府出台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对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行为进行规范,但该条例将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的职责交与地方政府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公平竞争审查力度不够,且该条例明确规定有利于科技进步的政策文件不适用于该条例,导致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科技化,即将违反公平竞争的地方政策包装成为科技促进政策。例如,各地围绕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密集出台的“算力券”政策,不断加码算力补贴力度,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围绕算力政策的“内卷”延伸到经济领域。

在现行的财税体制下,生产规模与地方经济财政指标直接挂钩,财政压力促使地方政府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进而增加税收收入(黄宗智,2009)。以增值税、消费税和关税为主的间接税长期占税收收入较大比重,是财政的重要支柱,而间接税与行政区内企业营业收入或生产规模直接挂钩。因此,地方政府为扩大税基有强烈动机引导企业扩大生产性投资。由于提高税率和开设新税种的权力主要集中在中央,地方政府最直接、最自主的增加税收方式就是扩大税基,支持“短平快”的产能扩张项目,这可能导致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地方为了维持产业竞争优势,通过各种手段压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在劳动力成本方面,政府默许本地企业“非正规”地使用廉价劳动力(冯志轩,2025),虽然形成了低成本的区域竞争优势,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全国劳动收入份额偏低和居民消费能力不足,进而制约市场规模的扩大。

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受到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地方政府没有从需求侧直接扩大国家整体市场规模的激励,但很注重区域经济增长和基于生产规模的税收收入。对于地方政府而言,扩大市场需求受益的是整体,但成本却由地方政府承担。商品

市场是全国统一的,增强社会保障能力和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以扩大市场需求规模受益的是全局性的,其他区域很容易“搭便车”,而本辖区内受益有限,因此,缺乏扩大本辖区内市场需求规模的激励。在区域竞争格局下,各地政府以生产为导向,围绕着技术、创新与生产展开区域经济竞争。以新能源汽车“内卷式”竞争为例,为抢占新能源汽车赛道,各地政府不顾区域比较优势,都将新能源汽车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且对新能源汽车生产环节过度侧重,加码新能源汽车产能扩张,但并不关心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对地方政府而言,本地新能源汽车的产能增加是其职责范围内需要支持的,而新能源汽车的市场需求则是其职责之外的事项。例如,2026年央视曝光江西宜春为吸引哪吒汽车,大搞政策洼地,国企投近3亿元代建厂房,每卖出一辆在宜春产的哪吒汽车再奖励2万元,总投入约14.2亿元。面对新能源行业持续扩张的产能和有限的市场需求,哪吒汽车长期低价销售,亏损经营。这种只负责扩张产能不顾市场需求的地方政府行为导致严重的产能过剩。当所有地方政府都只负责促进新能源汽车产能扩张而不顾新能源汽车需求能否赶上产能扩张时,新能源汽车的总供给持续超过总需求,“内卷式”竞争则是新能源汽车企业为获得生存空间必然的选择。

地方政府对投资的过度激励是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在政治集权与经济分权的经济体制下,在产业发展过程中过于强调地方自主性而忽视了中央顶层布局的统筹性,地方政府对扩大市场需求规模的激励不足,但对扩大辖区供给规模却有很强的政治激励。地方政府通过补贴、税收优惠、用地倾斜等政策诱导企业扎堆新能源汽车、光伏、低空经济和人工智能等热门产业,压缩技术迭代周期虽然加速了科技进步速度,却也导致各区域产业同质化和产能过剩,为“内卷式”竞争的产生创造了必然条件。

(二)经济形势变化加剧“内卷式”竞争

自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深度干预供给侧经济指标已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情况,但为何近年来“内卷式”竞争问题突出并引起广泛关注,成为中央重要的经济议题?在国民经济增速下行期,市场需求有限,随着渐进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作用日益加强,但近年来“内卷式”

竞争问题突出,可以说是在宏观经济增速放缓、市场需求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滞后等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持续发酵的结果。“内卷式”竞争增量发展受限转为存量竞争过程中市场经济竞争激烈的表现,也是国民经济循环存在堵点卡点的具体表现。由于总需求不足,供给侧的企业面临“蛋糕”做不大的困境。为了生存,企业只能在存量市场中通过极致压缩成本、过度营销甚至恶性竞争来抢夺有限的市场,而非通过提升品质和服务来创造新需求。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形势是“内卷式”竞争产生的重要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内卷式”竞争和产能过剩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其反映的是同一个经济问题,即市场需求规模的有限性。

相较于产能的快速扩张,市场需求增长缓慢、停滞甚至收缩,致使有限的市场需求规模成为难以突破的瓶颈,为了既定的市场需求而竞争,则形成了“内卷式”竞争。近年来,国民经济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生产者价格指数持续低迷或负增长、消费者价格指数低位运行、GDP平减指数持续为负,整体经济长期面临通缩风险,这意味着全国的市场需求停滞或收缩。在宏观经济形势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对地方政府和企业而言,市场需求是极其重要且有限的瓶颈资源,短期内很难通过微观市场主体自身努力实现市场需求规模的扩张,因此,受到瓶颈资源的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被迫开展“内卷式”竞争。

“内卷式”竞争不是近期出现的,但其剧烈的负面影响在经济放缓时期开始显现出来。“内卷式”竞争是当前宏观经济增长放缓和要素投入回报边际递减后,过度依赖制造业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存量竞争加剧的典型表现。当通过开拓新市场、创新新技术来获取增量收益变得困难且缓慢时,理性的经济主体便会将重心转向对现有市场份额和资源的激烈争夺。当前需求收缩和预期转弱等加剧“内卷式”竞争,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低于收入增速,预防性储蓄倾向上升,有支付能力的社会总需求持续低于经济的潜在产出水平,有效需求不足长期持续存在。

虽然国民经济环境变化使“内卷式”竞争问题变得突出,但国民经济运行环境的变化并非导致“内卷式”竞争的根源,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环境只

是催化了已有的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和体制性问题,加剧了“内卷式”竞争,并在近年来伴随着通缩问题日益凸显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国民经济运行环境深刻的变化是“内卷式”竞争产生的催化剂,区域经济陷入供给主导的增长模式无法摆脱靠过剩产能与补贴推动产业扩张。产能过剩、激烈竞争导致价格持续下跌,形成“内卷”的恶性循环,全行业利润率被挤压。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企业采取“以价换量”的生存策略,加速经济内卷化。市场空间受限,为争夺有限的市场份额,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给和需求的作用。此时,降价一方面可以增加需求量,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降低供给量,从而缓解供强需弱的矛盾。但在价格机制发挥调节供需平衡的过程中,市场的竞争机制也在发挥作用,企业为了获得利润和寻求生存空间,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降低价格刺激销量是遵循市场逻辑的理性选择。

此外,由于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和不确定性增强,民众增加储蓄以应对未来不确定性,能省则省成为主流消费思潮,消费降级是主动应对未来经济不确定的理性选择。因此,在叠加消费降级的背景下,企业通过降低产品质量和价格,是顺应国民经济发展形势的理性选择。然而,微观企业和居民在宏观经济持续下行和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的理性选择而言,宏观上却引发了经济收缩、通缩加剧和经济低迷等不良影响。因此,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不能仅就“内卷式”竞争本身入手,而是需找到导致“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试想如果经济上行,市场需求规模扩张、产品供不应求,居民部门预期未来收入会上涨,对未来经济发展充满信心,物价温和上涨并伴随着消费升级,则会打破“内卷式”竞争的经济环境。在此情况下对企业而言,价格和竞争机制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此时微观经济主体理性的选择应该是调涨产品价格,并扩大产品供给。在市场经济中,需求收缩并伴随着供给增加,则必然导致产品价格下降,企业倒闭和失业增加,在价格调整供需平衡的过程中,伴随产生为了企业生存和地方政府保就业的“内卷式”竞争。但不可否认的是,“内卷式”竞争是宏观经济下行过程中各区域经济增量发展受限转为存量竞争的必然,其无发展的内在属性阻碍国家进步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为矫正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结构,发挥价

格机制调节供需平衡的作用实现市场出清,地方政府不应强化对市场资源配置的干扰,而应增强民生保障,促进居民收入和消费增加。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从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分析地方政府围绕供给侧展开区域间的产业竞争而带来“内卷式”竞争的负面效应及其制度根源。从市场失灵的角度看“内卷式”竞争并非微观经济主体的非理性过度竞争,而是地方政府深度干预辖区内经济,微观主体理性选择后的“合成谬误”。综合市场需求规模有限和“内卷”具有“过密化”的核心特征看,“内卷式”竞争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国民经济运行中区域间产业竞争的衍生,体现的是增量发展受限转向存量竞争的经济收缩。在现有的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体制下,地方政府不当干预市场经济是“内卷式”竞争的制度根源,地方政府从区域利益出发,压低辖区内企业综合生产经营成本,不顾整体市场需求停滞或收缩,推动辖区内产能扩张和供给增长,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偏好供给侧的经济指标,对需求侧的支持激励不足,而近年来供强需弱的宏观经济环境进一步加剧了“内卷式”竞争。

虽然行业自律限产短暂缓解了“内卷式”竞争的低水平重复内耗,但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关键在于改革地方政府干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治激励,弥补市场需求规模不足的短板,激励地方政府扩大辖区内的市场需求规模,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干预辖区内经济促使整体层面产能扩张和市场供给增长远快于市场需求增长的现状。首先,要加快构建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与分工机制,减少区域之间围绕供给侧指标的过度竞争,严格贯彻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确立市场中性的竞争原则,出台规范地方招商引资的措施,同时应避免地方政府以整治“内卷式”竞争为由过度扭曲市场机制导致越反对内卷,反而会越卷。其次,将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作为地方政府的考核指标,引导地方政府从“重生产”向“重消费”和“促民生”转变。传统的产业政策补贴生产者以扩大产能,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产业政策应转向补贴消费者,以此来扩大市场需求,跳出产品低价、产能过剩的陷阱。最后,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发挥国有资本支撑共同富裕的

战略功能,提升劳动在国民收入份额中的占比,通过提升居民收入和消费能力改变供强需弱的国民经济运行环境。要减少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经济的过度干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起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和分工机制。

注释

①2024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制定《关于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要求各地招商引资行为不得任意而为,在政策优惠方面不得开展恶性竞争。

参考文献

- [1]刘志彪,孙文婷.投资于人:发展动能转换的逻辑与产业政策取向[J].南京社会科学,2025(9):30-40.
- [2]黄宗智.发展还是内卷?十八世纪英国与中国:评彭慕兰《大分岔: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2(4):149-176+191-192.
- [3]邹晓蔓,张成鹏,涂圣伟.产业“内卷式”竞争的生成逻辑、内在特征与治理策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6):56-63.
- [4]赖淑君.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演化逻辑、生成机制与突围路径[J].企业经济,2025,44(9):102-111.
- [5]王海燕,张占斌.“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改革,2025(3):11-21.
- [6]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美)黄宗智中华书局,2000.
- [7]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J].社会学研究,2004(5):96-110.
- [8]王海燕,张占斌.“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及治理[J].改革,2025(3):11-21.
- [9]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J].经济学家,2025(5):88-97.
- [10]欧阳日辉,刘璇.数字平台“内卷式”竞争的发生机制、潜在风险与破解对策[J].财经问题研究,2025(3):3-19.
- [11]卢晓雯.多维视角下的内卷化:研究现状及概念梳理[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6):130-136.
- [12]李晓华.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4):50-54+235.
- [13]张鹏,胡蝶.整治“内卷式”竞争:理论、事实与对策建议[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1):54-59.
- [14]张杰,任元明.中国“内卷式”竞争的主要特征、形成机制及其破解之道[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2):50-61.
- [15]马恩涛,李鑫,姜超.中国式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支出预算执行偏差:基于纵向分权与横向竞争的视角[J].中国农村经济,2024(1):149-174+187-194.

- [16]孙晋.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的危害及破解之道[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5(2):68-72.
- [17]李雪松,高辛睿.地方政府“内卷式”竞争”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吗?——基于239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5(4):183-195.
- [18]刘衍峰,涂良川.民营经济“内卷式”竞争的衍生机制、风险表征与破局策略[J].经济学家,2025(5):88-97.
- [19]陆雄杰.“内卷式”竞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形成机理与治理路径[J].理论导刊,2026(2):127-135.
- [20]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1]郭威,李泽浩.“内卷式”竞争:内涵、成因与治理[J].理论探索,2025(4):95-102.
- [22]李晓华.新兴产业“内卷式”竞争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J].价格理论与实践,2025(4):50-54+235.
- [23]周飞舟.锦标赛体制[J].社会学研究,2009,24(3):54-77+244.
- [24]蔡之兵.加快形成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制度闭环:内在机理与系统路径[J].经济学家,2026(1):89-98.
- [25]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26]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激励与合作:兼论我国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J].经济研究,2004(6):33-40.
- [27]蔡之兵.竞争过度还是竞争不足:“反内卷”的认知误区、操作难点和政策建议[J].河北学刊,2025,45(6):12-20.
- [28]孙久文,张翱.论区域协调发展视角下“行政区经济”的演变[J].区域经济评论,2020(6):25-29.
- [29]郑永年.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
- [30]黄宗智.改革中的国家体制:经济奇迹和社会危机的同一根源[J].开放时代,2009(4):75-82.
- [31]尹振东,聂辉华.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20,19(2):411-432.
- [32]王文甫,明娟,岳超云.企业规模、地方政府干预与产能过剩[J].管理世界,2014(10):17-36+46.
- [33]白让让.市场引导、政府干预失灵与“双低企业”空转运营[J].经济学动态,2017(7):44-57.
- [34]晏军锋,李昊.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内卷式”竞争:表现、成因与治理路径[J].广东经济,2025(17):16-20.
- [35]尹振东,聂辉华.腐败、官员治理与经济发展[J].经济学(季刊),2020,19(2):411-432.
- [36]胡彬,余子然.地方财政压力对城市生产率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基于新型城镇化背景的分析[J].财经研究,2021,47(6):139-153.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and its Institutional Roots

Zhang Ao Ji Baofeng

Abstract: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hinders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y tracing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 of “involution”, this analysis examine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and its economic impac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exist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s. Due to a lack of cross-regional coordination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local industrial policies, overinvestment and excess capacity emerge as rational decisions made by local governments pursuing regional interests amid limited market demand. This creates th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Under a government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prioritizes the supply side, local governments utilize industrial policie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al costs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s, supporting excessive investment and capacity expansion, thereby forming a supply-side priority strategy characterized by an emphasis on production over consumption. Developmental local governments intervene deeply in the investment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 within their jurisdictions; consequently, incremental economic growth has shifted toward cutthroat competition over existing market share among regions, further intensifying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response, a comprehensive rectification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must begin by improv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operating environment where supply is strong but demand is weak. It requires accelerating economic system reforms to realign incentives for local governments, establishing a robust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building efficient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division-of-labor mechanisms. Furthermore, it is essential to guide the shift in the focus of local government functions from supply-side intervention to demand-side management.

Key Words: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Regional Competition; Overcapacity; Institutional Reform

(责任编辑:正 漪)